

勵耘學刊

总第八辑 二〇〇八年

學苑出版社



勵耘學刊

(文学卷)

2008 年第 2 辑
(总第 8 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學苑出版社



勵耘學刊

(语言卷)

2008 年第 2 辑
(总第 8 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励耘学刊. 第8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077-3216-0

I. 励… II. 北… III. ①文学研究-文集②语言学-文集
IV. I0-53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1095 号

责任编辑:刘 丰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印 刷 厂: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厂

开本尺寸:787 × 1092 1/16

印 张:37.75 印张(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本)

字 数:600 千字(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本)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08.00 元(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本)



《励耘学刊》(文学卷)编委会

顾 问:童庆炳

主 编:郭英德

副主编:李春青 李 山 杨联芬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 宁 乐黛云 刘 利 刘晓南

孙银新 李国英 李运富 李春青

李 山 李 强 李宇明 陈思和

吴福祥 张 健 张涌泉 杨 义

杨联芬 郭英德 项 楚 温儒敏

曹卫东 盛 宁 蒋原伦

冯胜利(美国) 大西克也(日本)

竺家宁(中国台湾) 黄坤尧(中国香港)

李欧梵(中国香港)



《励耘学刊》(语言卷)编委会

顾 问 王 宁 何九盈

主 编 李运富

副主编 刘 利 孙银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 宁 乐黛云 刘 利 刘晓南

孙银新 李 山 李春青 李宇明

李运富 李国英 李 强 吴福祥

陈思和 杨 义 杨联芬 张涌泉

张 健 项 楚 郭英德 曹卫东

盛 宁 温儒敏 蒋原伦 蒋冀骋

冯胜利(美国) 大西克也(日本)

竺家宁(中国台湾) 黄坤尧(中国香港)

李鸥梵(中国香港)

编 务 王海平 龙 琳

励耘学刊
PDG

目 录

新思维

- 《苦闷的象征》之为中国新文学理论资源考辨(上) 陈方竞(1)
从叙事的没落处开始 敬文东(28)
论民间文学表演文本的审美特质 万建中(53)

文学史专题

- 身体与记忆——六朝志怪中的性别变乱 刘苑如(64)
论《诗经》的文学原始性与民间性 钟宗宪(97)
冯梦龙《情史类略》与安德烈·勒·夏普兰《爱情论》:
 对两种不同爱情观的诠释 [意]史华罗(121)
透视生存虚无——存在主义视野下的《示众》及其启示 ... 彭小燕(145)
在女性身体,文本与革命意义之间的移行——对张天翼小说
 《移行》的一种符号学的解读 [美]李 力(157)
穿越恐惧、希望、欲望和绝望——论哈金作品对
 “等待”主题的反思 [美]赵和平(著) 张清芳(译)(169)

文化研究

- “六舞”与“六诗”关系考(下) 周延良(192)
《甲寅》杂志的发起、传布和停刊 孟庆澍(210)
一位现代女作家的诞生——以凌叔华为例讨论现代女子教育与
 中国妇女写作的转型 张 莉(218)
1980年代“文化热”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下) 贺桂梅(234)
当红色经典遭遇恶搞——对一起媒介事件的文化分析 ... 赵 勇(250)

青年园地

- 两种超越性——由死亡展开的两种向度 郑岳和(269)
- 论晚唐的虚化咏物诗——从李商隐《泪》谈起 谢 琰(280)

文史名家

- 钟敬文的民俗学神话学 潜明滋(288)
- 红楼遗民张中行 孙 郁(312)

品书录

- 穿越五千年的历史——读李山的《先秦文化史讲义》 曲利丽(322)
- 评刘洪涛先生
《荒原与拯救：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劳伦斯小说》 张 珂(327)
- 《励耘学刊》(文学卷)征稿启事 编辑部(332)



目 录

汉语词汇类型近现代以来发展演变特点谈片	周 荐(1)
词的色彩意义的研究及语言价值	孙银新(20)
《周礼·考工记》行为词语系统	李亚明(27)
《汉书》显示单音节形容词同义关系的常见格式	李艳红(58)
瑜不掩瑕——《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训诂得失	李维琦(75)
敦煌变文疑难疑义字词考释	赵家栋(92)
《左传》“速”字释义商榷	汪维辉(103)
《老子·道经》第十四章异文考察	王 曦 曾永胜(107)
《汉语大字典》误用《释名》声训考辨(四)	李国英(116)
《说文解字系传》音训研究	吴泽顺(127)
《回回药方》的成书年代及其对音材料	
· 所反映的语音特点	蒋冀骋(144)
万光泰《四声谱考略》校注(下)	张民权(155)
今本《说文》正篆字数考	崔枢华(192)
“瞻”字异构补释	孟蓬生(208)
从“休”说到“木”	
——“休”字的本义和“木”字的引申义	张习东(213)
试论清末民初语言的研究	刁晏斌(218)
汉语量词研究的范畴化视角	宗守云(233)
“何况”和“况且”	刘 慧(244)
《励耘学刊》(语言卷)征稿启事	本刊编辑部(256)

《苦闷的象征》之为中国新文学理论 资源考辨(上)^①

◇陈方竞^②

摘要:厨川白村以《苦闷的象征》为代表的文艺论著,自“五四”以来进入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学院文化与社会文化认识或接受的不同,看到鲁迅与周作人截然有别的认识和理解,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鲁迅译介《苦闷的象征》等论著具有自己的独立特征,使之在中国新文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并显示出他与厨川之间的差异,他通过与俄国文学的联系,深化了厨川文艺论著蕴含的生存意志论、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独立形态和意义。

关键词: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中国新文学;鲁迅;周作人;沈雁冰;穆木天

日本的厨川白村以《苦闷的象征》为代表的文艺论著“五四”以来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不应忽视的影响。但是,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为日本从事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学者甚少关注,^③在中国学者的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论著中也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研究多浮在表面,难以深化。^④这与厨川在日本文化环境中作为“棘手的文明批

^①本文所属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项目《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批准号:07J02)。

^②陈方竞,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③我查阅翻译过来的日本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著,除了中井政喜的一篇《厨川白村与1924年的鲁迅》,大多都不涉及厨川白村。

^④中国学者的中日文学关系研究论著一般均未涉及厨川白村。中井政喜的《厨川白村与1924年的鲁迅》1985年翻译到中国,译者在“译后记”中说:“本文过分强调了厨川对鲁迅影响和当时鲁迅思想的‘阴暗’、‘绝望’,显然是不妥的。”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译丛》,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83页。

评家”而“多得怨敌”的境遇相关,^①更主要缘于厨川著述之进入中国新文学呈现的复杂状况,反映了以《苦闷的象征》为代表的文艺论著之被中国新文学接受、理解和认识的艰难,而需要我们对此重新做出梳理、考察和辨析。

—

对厨川白村著述的关注,最早见于《新青年》。《新青年》6卷6号刊发了朱希祖翻译的厨川《文艺的进化》及《自然主义与晚近新文艺比较上美丑的问题》,朱希祖在“译者案”中认为,在中国仿效西方提倡浪漫派、新浪漫派文学,如厨川所说是“故意用人工的技巧来掩补那丑,补了自然的缺点,宛然把极臭的物,做了一盖,放置其上”,因为中国文艺“尚在拟古时代”——“文艺若求进化,必先经过自然派的写实主义,注重科学的制作法,方可超到新浪漫派的境界。若不经这个阶段,而漫然学起新浪漫派的文艺来,恐怕仍旧要退到旧浪漫派的地步。因为未讲科学而讲新神秘主义,未能写实而讲象征主义,其势不陷入于空想不止的”。显而易见,这是从胡适(包括陈独秀)的文学观^②出发对厨川著述的理解,并不切合厨川以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为根柢建立的现代文学理论,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倡导突出的学院文化特征。^③王富仁在《“新国学”论

^①鲁迅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说:“辣手的文明批评家,总要多得怨敌。我曾经遇见过一个著者的学生,据说他生时并不为一般人士所喜,大概是因为他态度颇高傲,也如他的文辞。这我却无从判别是非,但也许著者并不高傲,而一般人士倒过于谦虚,因为比真价装得更低的谦虚和抬得更高的高傲,虽然同是虚假,而现在谦虚却算美德。然而,在著者身后,他的全集六卷已经出版了,可见在日本还有几个结集的同志和许多阅看的人们和容纳这样的批评的雅量;这和敢于这样地自己省察,攻击,鞭策的批评家,在中国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见《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页。

^②胡适对此的意见,比较典型地体现在他1921年7月到商务考察,在商务编译所与郑振铎、沈雁冰针对《小说月报》的一番谈话,后面有引述。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即认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见陈独秀:《答张永言》,《青年杂志》1卷4号。

^③参见陈方竞:《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中的左翼理论资源》,《新国学研究》辑刊第5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141页。

纲》^①中提出“五四”后新文化向现代革命文化、现代学院文化和现代社会文化分流发展,厨川著述是在1921年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独立发展中,具有了进入中国新文学的可能。

但是,1921年后作为现代社会文化表现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厨川著述却取迥然不同的态度。以文学研究会为主体的国内新文学作家,在深切感受到“五四”后社会文化领域“梦醒来而无路可走”的苦闷的“时代病”时,所写“社会问题小说”,却转向对与他们体验到的社会人生实际相游离的抽象、空幻的“爱”与“美”的追寻,而难以与《苦闷的象征》相共鸣。这种状况与沈雁冰文学批评的影响直接相关。沈雁冰与更具有“域外性”的创造社作家不同,是在新文化倡导运动直接影响下走上文坛的,但是,他作为社会文化领域中的青年批评家,文学批评却更多带有陈独秀革命文化和胡适学院文化的特点。这一者表现在,他对时代和社会发展持积极乐观态度,难以承认也不敢正视“五四”新文化倡导运动的退潮,主张“诅咒悲观”、“迷信乐观”,^②这是他初涉文坛即提出新文学“要尽力提倡非自然主义的文学,便是新浪漫主义(new-romanticism)”^③的根源,在他看来,“写实主义的缺点,使人心灰,使人失望,而且太刺戟人的感情,精神上太无调剂”,^④“自然主义的缺点更大”——“安得列夫(按:通译安德烈夫)的文学虽然好,但是他的思想却是悲观而颓丧到极点;阿撒巴希夫(按:通译阿尔志跋绥夫)的文学更完全是唯我主义(egoism)的文学。凡人失望到极点,容易悲观,容易颓丧,悲观颓丧到极点,而生之执着又极强,便容易流入唯我。颓丧和唯我便是自然文学在灰色的人群中盛行后产生的恶果!”^⑤所以,1920年末,他在与周作人展开“翻译文学”的通信中,虽没有明确拒绝鲁迅翻译阿尔志跋绥夫和安德烈夫的作品,但却担忧作品宣扬的施蒂纳“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的影响,认为这种“肉的唯我主义唱得那么高,恐在从来不知有社会有人类的中

①见《新国学研究》辑刊第1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玄珠(沈雁冰):《乐观的文学》,原载1922年12月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57期,见《茅盾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页。

③雁冰:《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原载《改造》第3卷第3号(1920年9月15日),见《茅盾全集》第18卷第39页。

④雁冰:《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小说月报》第11卷第2号。见《茅盾全集》第18卷第28页。

⑤雁冰:《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原载《改造》第3卷第3号,见《茅盾全集》第18卷第39页。

国社会中,要发生极大的不意的反动”。^①他在《读〈呐喊〉》中说自己初读《狂人日记》“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得刺戟”,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这篇小说有真正认识,他就无法理解和认同鲁迅的“悲观主义”,说《呐喊》“是旧中国的灰色人生的写照”,“作者不会把最近的感想加进他的回忆里去,他决不是因为感慨目前的时局而带了悲观主义的眼镜去写他的回忆”。^②因此,他开始的文学批评就极力反对“五四”后弥漫于社会的“苦闷”和“颓废”的“时代病”,批评社会青年中出现的“厌世”和“享乐”,而把共鸣于王尔德、尼采、波德莱尔、安德烈夫等浸透着“‘世纪末’的果汁”(鲁迅称为“异域的营养”)的新文学倾向,看成是“名士派”的“颓废主义或唯美主义”的表现,视“伤感主义”、“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为新文学发展之“毒”。^③可见,同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沈雁冰与鲁迅之间,在新文学认识上存在根本相悖的一面,同时亦可看出,沈雁冰认识中不论是“新浪漫主义”还是“写实主义”、“自然主义”,都不是在自我社会人生体验上建立起来的,更缺乏对新文学感同身受的理解,所以在批评文章中他又有与此不同的说法,又认同于前述朱希祖在《新青年》6卷6号上翻译厨川著作发表的“译者案”,认为“该尽量把写实派自然派的文艺先行介绍”,^④这种自相“矛盾”,反映出他所说的种种“主义”的概念化,带有学院文化特点。1921年7月,胡适应高梦旦之邀到商务考察,在与郑振铎、沈雁冰的一番谈话中批评了《小说月报》提倡的“新浪漫主义”,^⑤二十天后出版的《小说月报》12卷8号的《最后一页》上,沈雁冰依照胡适的说法提出:“文学上自然主义经过的时间虽然很短,然而在文学技术上的影

①沈雁冰:《翻译文学书的讨论——复周作人》,原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见《茅盾全集》第18卷第74-75页。

②原载《文学周报》第91期(1923年10月),见《茅盾全集》第18卷第394-398页。

③沈雁冰:《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文坛的感想》,原载1924年出版的松江《学术演讲录》第2期,见《茅盾全集》第18卷第382-390页。

④沈雁冰:《“小说新潮”栏宣言》,原载《小说月报》第11卷第1号(1920年1月25日),见《茅盾全集》第18卷第14页。

⑤胡适说:“我劝他们要慎重,不可滥收。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我又劝雁冰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如梅特林克,如辛兀(Meterlinck, Synge),都是极能运用写实主义的方法的人。不过他们的意境高,故能免去自然主义的病境。”见《胡适的日记》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6-157页。

响却非常之重大。现在固然大家都觉得自然主义文学多少有点缺点,而且文坛上自然主义的旗帜也已竖不起来,但现代的大文学家——无论是新浪漫派,神秘派,象征派——那个能不受自然主义的洗礼过。中国国内创作到近来,比起前两年来,愈加‘理想些’了,若不乘此把自然主义狠狠的提倡一番,怕‘新文学’又要回原路呢!”^①由此,《小说月报》的《通信》栏上出现了一场“自然主义的论战”,他写出《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这篇文章对泰纳理论学院派式的生搬硬套,是科学主义文学观的典型体现。由其影响,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国内新文学作家之接受厨川以《苦闷的象征》为代表的文艺著述的可能。^②

与沈雁冰及其影响下的文学研究会明显不同,创造社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较少直接接受而更是一种感应关系。这些青年作家置身“脱亚入欧”、流行着“欧风美雨”的日本,现代社会的感觉也有助于他们对欧美文学营养的冥悟和汲取,他们又是一些敢于正视和宣泄自己内心痛苦、彷徨和颓废的人,表现出的更是“诗的”审美感觉和审美意识生成和升华的特点。因此,他们与厨川《苦闷的象征》有更强烈的感应与共鸣。1921年1月16日至21日,在宗白华主编的刊发郭沫若诗的《时事新报·学灯》上,连载了明权翻译的厨川《创作论》和《鉴赏论》。1921年5月,郭沫若说“文学是反抗精神底象征,是生命穷促时叫出来的一种革命”,“唯其有此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始生出向上的冲动,以此冲动以表现于文艺,而文艺之尊严性始确立”;^③1923年他更明确提出:“我郭沫若所信奉的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苦闷的象征’。”^④但是,就文学观与《苦闷的象征》的联系而言,创造社内部也有差异,存在着东京作家与京都作家之不同,京都作家的核心是郑伯奇,还有1926年被称为“创造社三诗人”的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坐落在日本腹地有“千年古都”之称的京都与更早面向西方的沿海大都市东京在文化特征上就有明显差异,在京都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郑伯奇、穆木天等,在文学批评观上与长期执教于京都的厨川有

^①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最后一页》,见《茅盾全集》第18卷第328页。

^②胡适开创的中国现代学院文化,是以对中外文化传统的学术化阐释实现知识化的文化传承为主要职能的,对博格森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尼采的超人学说、王尔德唯美主义和其他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具有明显的排斥性的。

^③郭沫若:《〈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是作者为他改编标点的王实甫《西厢》一书所写序,该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出版。

^④郭沫若:《暗无天日的世界》,《创造周报》第7号(1923年6月23日)。

更多的联系,对厨川批评理论的理解也更为深入。对此的认识,可以具体对比郑伯奇与成仿吾的批评观。成仿吾作为创造社批评家,他的批评观主要是借助法国基友(J. M. Guyan)社会学的文学理论建立起来的,^①与沈雁冰文学批评观并没有多大差异。《创造》季刊2卷2号刊发了成仿吾的《批评的建设》和郑伯奇的《批评的拥护》,两篇文章有明显差异。《批评的建设》认为对“浅显的对象与事情”可以靠“我们的感官”,“若对象与事情繁杂”就有赖于“后天的知识”,有赖于建立“我们的批评的标准”,认为前者仅仅是“欣赏”,后者才是真正的“批评”,“文学批评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判断”,“判断是我们的一种良能”,因此“批评的工作常少杰作的欣赏而多优劣的品评”。^②《苦闷的象征》论批评则是以“鉴赏论”提出的,认为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不是一种知识获取,不是按照某种原理或公式做出的文学史价值分析和判断,而是生命投入的“鉴赏”,是在阅读过程中受“刺激”而发生的“生命的共感”和“自己发见的欢喜”,是一种“自行燃烧”的“共鸣底创作”。^③郑伯奇的《批评的拥护》恰恰是从与厨川的联系出发的,明确表示不取法国泰纳和布鲁涅梯尔“纯用科学的方法”的社会学文学批评,提出“真正的批评家不是作者的应声虫,也不是‘艺术审判庭’的法官,他是一个创造者”。^④更能体现郑

^①温儒敏认为成仿吾文学批评文章“很少提及郭沫若、郁达夫等感兴趣的那些‘正宗’的浪漫派先驱,引述最多的反而是主张社会学文学观的基友(J. M. Guyan)”。见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基友是法国19世纪一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著有《社会学艺术论》一书,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功利价值和意义。

^②史若平编:《成仿吾研究资料》,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192页。这种认识在成仿吾的《建设的批评论》、《批评与批评家》中有一再说明。

^③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鉴赏论·自己发见的欢喜》,《苦闷的象征 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厨川即认为泰纳和圣蒲孚(通译圣·佩韦)是“站在科学底批评的见地上,抱着传统主义的思想的人,所以就将批评的标准放在客观底法则上,毫不顾及个性的尊严”。见《苦闷的象征 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第48页。

^④与郑伯奇相一致,穆木天在《法国文学的特质》(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6期)中批评布鲁涅梯尔的“‘社会的’是法文学的特质”的论断,认为这种认识仅“观得了法文学的外形”,是与“一偏的 l'évolutionisme (进化论)”和“从 H. Taine (泰纳)得来的实证的影响”相关,说:“他(布鲁涅梯尔)把文艺批评,弄成了判断;他忘却了文艺批评即是鉴赏。文艺批评,并不是比较甲乙作品的高下;文艺的评价是做作品的生命的欣赏。若是文艺批评的结果,仅仅得了几个公式,几个原理,那文艺的生命即是死了。”见陈惇、刘象愚编《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伯奇文学批评与厨川理论的联系,是他1923年发表的《国民文学论》,^①该文又反映出创造社京都作家对《苦闷的象征》的汲取,更主要体现在他们与法国19世纪早期浪漫派诗人的联系上,即远离祖国、留学日本的境遇感受,使他们钟情于“攻击政府,卒被逐放”而“一面自悲身世,疾首暴君”、“一面怀念祖国”的“王党后裔”拉马丁、雨果、维尼,他们在这些法国诗人“厌世、愤俗、怀古、爱乡的作品”中获得了更多情感 and 精神的慰藉,在他们看来,拿破仑的专制统治就是当今中国的社会政治,他们就是被中国社会“放逐”的拉马丁、雨果、维尼,这使他们从一个切己的角度理解了这些流亡诗人的“消极”和“厌世”,认为他们是“19世纪前半混乱不安时代的法兰西国民的代言人”,是“千古的大诗人大作家”。^②

在创造社京都作家中与《苦闷的象征》有更深刻联系的是穆木天,这主要体现在他1926年的文学批评中。穆木天文学批评整体上是通过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建立起来的,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诗”的理解和阐释上。他说“诗人”是“预言者”,“诗”是诗人“内生活的真实的象征”,认为:“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诗的世界固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的深处。诗是要暗示出人的内生命的深秘。”^③他把植根于诗人“内生活”和表现“人的内生命的深秘”的诗歌,称为“纯粹诗歌”,这种认识几乎就是从厨川诗学观中剥离出来的。^④但是,

^①该文明确提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这是现代文学的标语。一作家的作品,是作者自己苦闷的象征;一民族的国民文学,也不外这民族自己苦闷的象征。所以,国民文学决不是文明烂熟的自然结果,乃是少数创造者努力的结晶。……在内乱外患、两重压迫、国如累卵、民不聊生的今日,有自觉的文学家正好创造中国的国民文学。”见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创造周报》第35号。

^②见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创造周报》第35号。为此,1925年在《语丝》上穆木天、郑伯奇与钱玄同、林语堂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国民文学”的论争。参见陈方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第1章第3节《关于“国民文学”的提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原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16日),陈惇、刘象愚编《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④厨川认为:“诗人云者,是先接了灵感,预言者似的歌唱的人;也就是传达神托,将常人所未感得的事,先行感得”,“所谓神,所谓 inspiration(灵感)这些东西,人类以外是不存在的……无非就是民众的内部生命的欲求,是潜伏在无意识心理的阴影里的‘生’的要求。是当在经济生活、劳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的时候,受着物

穆木天 1926 年批评文章从未提及厨川白村，这根源于他从京都到东京形成的法国象征派文学取向与厨川之间存在着根本相悖的一面。厨川就明确提出：“所谓象征主义者，决非单是前世纪末法兰西诗坛的一派所曾经标榜的主义，凡有一切文艺，古往今来，是无不在这样的意义上，用着象征主义的表现法的。”^{[1] (P30)} 在《走向十字街头》自序中他明确表示不取维尼“象牙之塔”之说，^①部分批评文章结集就冠以《出了象牙之塔》之名。这是从维尼出发与法国象征派诗歌相联系建立起文学批评观的穆木天，所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他更明确拒绝了厨川的“出了象牙之塔”与“走向十字街头”这样一组概念和判断。^②穆木天文学批评始终回避厨川还有更重要的根源，他对日本文化的感受和认识就与厨川之间存在根本差异，他 1918 年留学日本，怀抱“万生归一，世界返真，礼乐安取，大道用彰，斯人间矣，斯天国矣”^[2]的社会人生理想，融入京都这个坐落在日本腹地的“千年古都”的传统生活中，为这里的生活场景、民俗风情、自然山水、乡野景致浸染、陶醉，受到在京都表现更为充分的日本“国民性”^③的濡染，孕育了他的“美化人生，情

（接上注）质主义、利害关系、常识主义、道德主义、因袭法则等类的压抑束缚的那内部生命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那无意识心理的欲望，发挥出绝对自由的创造性，成为取了美的梦之形的‘诗’，的艺术，而被表现。”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为预言者的诗人》，《苦闷的象征 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第 65、68-69 页。但也可见，厨川是在对日本国民生活批判中发掘“诗”作为“内部生命的欲求”的“预言”性质的，穆木天对此的阐释则表现出一种纯粹审美意识和审美形式的升华，是“诗”的审美神圣性的表现。

①“我所亲近的英文学中，无论是雪莱，裴伦，是斯温班，或是梅垒迪斯，哈兑，都是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文明批评家；不单是住在象牙之塔里的。这一点，和法国文学之类不相同。”这段话见《译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 10 卷第 241 页。

②穆木天 1925 年在《告青年》一诗中说：“不要看十字街头象牙的殿堂”，“不要看他们的武者小路，厨川白村。/不要上了他们一知半解的欺骗。/得努力追求人生的至义与艺术得幽深”，“诗歌不是在九霄天外，诗歌就在人间的国里；/北风刮来的黄土，春暖化出的淤泥，/农夫闲话时的心肝，内战时军人的哀泣，……/找出来，用最单纯的言语，缀成最新的诗。”原载《洪水》半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25 年 11 月 1 日），见《穆木天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43-244 页。

③见周作人：《日本管窥》，《苦茶随笔》（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41 页。